



走出历史的峡谷

孔 范 今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 插页 289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9—1505—0

I·1309 定价 16.80 元

# 走出历史的峡谷

孔范今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年

# 目 录

走出历史的峡谷 .....	( 1 )
超越五四文化模式 .....	( 5 )
“新文学”史断代上限前延的依据和意义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必要阐释 .....	( 10 )
经济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 .....	( 33 )
政治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 .....	( 50 )
文化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 .....	( 83 )
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与文学的补偿式调整和发展 .....	( 146 )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概说”二则 .....	( 167 )
中国近代四部著名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 .....	( 186 )
由一个范本看鲁迅后现代杂文的发展 ——我读田仲济先生的杂文.....	( 199 )

## 并非经验的总结

-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说略 ..... (215)
- 经典化 :作为一个新的话题..... (223)
- 一种畸变的文化生态 ..... (226)
- 重新读解孔子的智慧
  - 兼及 20 世纪的文化批判问题 ..... (230)
  - 一个通往文学新世纪不可逾越的话题 ..... (247)
  - 对当前文坛四个问题的省思 ..... (265)
- 面对鲁迅的姿态 ..... (286)
- 走近茅盾 ..... (290)
- 解读老舍 ..... (316)
- 《巴金选集》前言 ..... (357)
- 《郁达夫选集》前言 ..... (361)
- 对一位当代作家脚步的审视 ..... (364)
- 《黑劫》序 ..... (369)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追求科学性的重构
  - 答《作家报》记者问 ..... (377)

## 走出历史的峡谷

三年前，在《悖论与选择》的《自序》里，我曾谈到本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悖论性结构特征，而且，“甚至十分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通向理解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命题”。

我一向以为，某一时段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和驱动力，以及由其决定的多种独特历史景观，与该时期的特定历史结构和特殊结构效应密切相关。就以本世纪而言，如果不是这种悖论性结构，那么一切也许就不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样子。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转型，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调整中实现的，而启蒙与救亡则是构成这一进程历史结构的两大支点。按人们习惯上的理解，所谓启蒙就是以西方文化批判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历史行为，它从上世纪末即已发端，经过一个回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进入一个更新更深的层面，后历时起时伏，到新时期前期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所谓救亡，指的是中华民族变革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斗争，当然构成其主要内容的还是以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对象指认的暴力革命和政治革命。作为历史力量的聚焦点，这两个方面特殊的结构方式则是悖论性的对峙。尽管这两个方面在深层历史目的上并无二致，都是为了历史的更新发展，但它们在历史的认识和具体价值取向上却是背道而驰的。当它们以必不可少的前提进入历史的现实进程时，就已经给参与者施与了

悖论性的心理内涵——情感价值取向与理性价值取向的冲突。西方与中国的强制性对话，使两方均有双重角色选择：西方列强既是中国人的先生，又是敌人；中国人则既是学生，又是被欺凌和被侵略者。这种心灵的痛苦，无论是坚持启蒙还是坚持救亡的人无一能够逃脱，只不过各有不同的调适办法而已。而在作为历史行动的现实展开中，启蒙和救亡则又表现为两种历史力量的对抗，在不同时期各得风流，并在对峙中转化发展。

我们不能同意只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否定另一方的观点，事实上双方各有其作用和局限。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救国论”，它虽然在颠覆历史的文化障碍方面有其独特的功效，但其空想主义的历史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其空想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批判的武器确实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无法完成只有救亡才能完成的任务；二是需要启蒙的现实并没有提供可以实现启蒙目的的历史条件，被启蒙者不具备可以接受启蒙的文化基础，对话不能实现。它所起的作用，只是在知识者范围或曰在作为社会文化核心的知识者话语内改变价值取向和基本结构，从而引导历史的发展。救亡相对于启蒙来说，则是更直接有效地改变阶级或民族现实生存状况的实践性力量。如果说启蒙使用的武器是西方文化的话，那么救亡所依赖的则是社会集团的力量。但也正因如此，在其调动社会集团力量时，就必然向阶级的或民族的本位文化认同，而与启蒙主义相对立。由此可以看出，启蒙和救亡各以其历史不可缺失的一面，支撑着历史，这或者也可以看作中国历史在特殊前提下以特殊方式进入和推进近、现代化过程时，所必然呈现的唯一可能的现实性结构。历史可以评价，但不能假设。

应该说，这种独特的结构，造成了独特的效应。第一，对峙双方各自向极端处的强调，强化了历史的双重需要，保证历史以补偿的方式实现总体上的综合发展。第二，对峙双方均以

功利主义的现实性历史目的为行为目标，强化并突出了本世纪社会行为的历史性内涵，同时也保证了历史性目的对文化价值系统的全面笼罩。第三，由悖论性对峙所造成的紧张，使历史参与者们经常处于自觉、警醒的精神状态，强化了历史参与者主体性能力的发挥，并由此形成了本世纪历史的精神性特色。第四，对峙双方之间所产生的疏离性空间，也使一些非历史功利主义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派别有了立足之地。否则，也就不好理解像新月派之类的思潮和实践何以会出现并获得发展了。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它同样显而易见的负面效果。撮其要，至少有以下数端：其一，泛化的历史性批评模式。由于对历史价值范畴的单一化强调，忽视了其他价值范畴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对其他价值范畴中的价值创造常常采取否定态度，构成为错位的批评。譬如 30 年代对梁实秋的“人性论”，以及这之后出现的“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尽管从当时的社会斗争的需要来看，其批评有其合理性，但被批评对象在当时的主导性价值强调，并不在历史价值领域，而是在文化科学和文学独立品格方面，这就难免使之攻击不当，引为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遗憾。回首检视一下，会发现此种错位的批评几乎贯穿了整个世纪，它们的价值只应到社会史中去获得肯定，而在文化史和文学艺术史中则应另当别论。

其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认识处理问题的过激主义态度。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形成了。悖论性对峙必然导致思维方式上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机械化倾向，因此，本世纪以来，对哲学上矛盾双方斗争性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说在彻底批判传统文化中有被抛却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最为可惜的当属传统人文精神的“中庸”思想了。那种“叩其两端”、积极调控各种关系的丰富而深刻的传统哲学遭到唾弃，而过激主义的态度则成为竞相效仿的时髦。

迄今人们仍然认为，形而上学和过激主义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殊不知，极左思潮也是一种结果，作为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历史结构的深处。

其三，工具理性主义和唯“新”是骛。强烈的历史功利主义追求，使“功利性”成了所有创造的价值核心。因此就不难理解，同样是西方知名哲学家，而罗素和杜威到中国来为什么其反响的不同不啻有霄壤之别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所以受欢迎但又被庸俗化理解的原因，也当是不言而喻的。文学艺术理论中长期奉行的“工具论”，就是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尤其需要说一说的，是在上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这种功利主义的结合中，对“进化论”这个鼓舞了本世纪一代一代人历史信心的理论，也作了简单而庸俗的理解，一切唯“新”是骛。这种倾向与其他不良倾向相比，迄未被人们认识，应引起深思。现在有的人仍竞相以制造“新”的效应来作为博取名利的手段，则不但叫人扼腕，而且更是令人生厌了。

现在本世纪即将结束，而值得庆幸的是在其结束之前，历史终于有条件找到了消解悖论结构的根本道路，那就是经济革命。本世纪历史曾经历过文化革命、暴力革命、政治革命，它们都是历史必经之路，但却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只有经济的改革开放，才真正在深层意义上将生存现状的改变、文化的变革和科学转型统一起来。虽然随之出现了商潮冲击文化的遗憾，但这是秩序调整中出现的失控，而不是根本性的矛盾症结。我以为，倒是我们应该以更主动的姿态调整自己，尽快走出本世纪历史的峡谷！

## 超越五四文化模式

在进入本文题目所指示的意义阐释之前，我想有两点需要申明。第一，历史对象的确认。“五四”，无疑是本世纪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人们触及这一话题时，常常对两个历史内涵不同的活动，即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不予细分，混同于一个历史单位，均以“五四”笼统称之。这种粗纹路的历史处理，实际上掩盖了二者之间深刻的甚至逆向的历史差异。虽然两者都是作为一种历史活动而表现为共同的历史目的，而且在历史行程的动态结构中也不可否认地存在着深层的因果关系，可前者是文化的，表现为向外性，后者是政治的，表现为向内性，这也是不可不认识的。否则，就会像事实上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在共同的肯定中却隐藏着两种误导：政治话语中把新文化运动作政治的比附，文化话语中把政治的爱国运动作文化的曲读。这样就容易忽略历史至此所发生的重要转折，而只是看作一般的深化。我们在此文中也沿用“五四”的称谓，是尊重长期以来历史形成的习惯，在这个已经符号化了的称谓后面，所指的对象实际上是发生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所谓“超越”的意义所指。作为一种历史的对应物，文化本位主义的思潮从一有西化思想出现时就出现了。自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则更是以其前所未有的尖锐的针对性，和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说服力，与之抗衡。由两种文化思潮构成

的犄角之势，在本世纪的历史流程里互动发展，此长彼消，迄未终结。不管文化本位主义有没有或者有多少近期或远期的历史作用和内在合理性，我们都不能同意其对新文化运动和由其标举的“五四精神”的根本性否定。试想，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及至60年后新时期前期的富有攻击力的文化批判，没有在其精神导引下对数千年历史沉积而成的滞重文化心理结构的颠覆性调整，哪会有今天的文化心理内涵和社会话语！因此，我们所讲的“超越”，决不等于“重新站队”，转到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上去进行反评价。现在，本世纪行将结束，围绕文化问题，历史也已打了几次旋转（大的回旋至少有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时期三次），是该回过头来，把视野放开，认真进行反思性的总结了。但是，当一段历史日渐远去的时候，没有比简单否定再轻而易举的了；同时，也没有比这种行径更不负责任的了，因为它于史无补却于现实有害。

我们说的“超越”，还与另一种评价的取向不同。近些年来，台港及海外的一些学者们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五四精神”的评价，比较趋新的一种认识基调是：历史性地肯定和现实性的否定。他们把对象放置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空内辨析其不同的作用，从而得出了从“五四批判”到“批判五四”的动态性评价。这种评价注意到了历史时空的转换和对象正负面内涵的作用消长，应该说是比较接近于科学态度的。可是，我们注意到，当他们进行这种动态的考辨时，只是单一角度地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着眼，无非是对传统文化采取坚决批判态度的“五四精神”在当时是对的而在现在则另当别论之类，这就未免流于狭窄和浅薄了。我们以为，“五四精神”对传统文化的过激态度固然诚如他们所言，但这是不难被认识并矫正的，众多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自身的态度转换及本世纪文化的实际发展过程，即是明证。更深层的问题倒是“五四精神”内在的价值

认识结构是什么，它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认知模式。而这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在今天与“五四精神”进行新的对话，必须超越在同一认识层面上的是非争论（转换了时空并不一定改变了认知层面），而从新的高度往更深处看，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那么，“五四精神”的内在价值认识结构或简言之“五四文化模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它由两个支点构成，一是目的性的，一是标准性的，而两者构成为一个认识模式时又随时转换，并无严格的界限。先说前者。新文化运动乃至其后不同历史时期内对其精神的张扬，虽然举起的是文化变革的旗帜，但其目的却是社会历史的变革，文化变革只是被视为跨出古老历史进入新天地的必经之途。这已是不争之论，同时也是前此多少年来对“五四精神”评价中形成主流的“目的论”研究的基本着眼点。但如果沿此逻辑往下引申，结论就会是：当文化只是被当作历史（注意：不是包容着一个民族或全人类丰富生存内涵的长远的历史，而是具体历史时空内的社会政治史）并进而视之为历史障碍物时，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人们的认识范围里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并被简化为枯燥的毫无意义的存在了。对攻击目标的单向化简单变异，势必同时简化了历史进程的方程式，这样固然增加了攻击的力度，但终因由此而造成的对象的非全部真实性即一定程度的虚拟性，而致攻击与对象之间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攻击者们有声有色的打打杀杀，似乎也不能有效地致敌于死命。如前所言，在这里我们无意于否定这一悲壮的斗争，而且实际的历史斗争总是用“减法”的，对此要做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我们的目的不过是以此为基础，说明一个更深一层的结论，就是：由对文化的这种单一的历史价值取向，导致了对文化价值多范畴性存在的否定。本来，文化价值的丰富性表现在多重范畴之中，如历史

的、文化的、审美的等等，不能一概而论。而且，文化价值内涵的多范畴性又相互关联和制约，它对历史的作用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其丰富内涵或多方面要求的系统性复杂参与上，即使在历史价值范畴里论定其价值，也不能只看单方面的效应。否则，在赢得在某一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功勋的同时，却丧失了在其多种范畴中的科学性，以及作为历史准绳的长远合理性。以“五四精神”看取文化时，不仅对传统文化取这样的态度，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古”；而且对现代发生的非启蒙型的其他文化走向也取这样的态度，因为它们是站在或者似乎是站在“古”的一边。所以，其中不单是一个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而在深层更起作用且会延及对其他异己文化的态度的，还是决定其基本价值估衡的既泛化又狭窄的历史性目的。

第二个支点是其价值尺度。“五四文化模式”所取的标准是西方文化，这也应该是不争之论。当时在文化问题上的“中外”之争，既然是“古今”之争，那么毫无疑问，代表着历史进步的西方文化也就是我们的理想参照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前期构成了与文化本位主义的紧张对峙。上述所言历史冲击力，正是在这个对峙中形成的，非如此，大概不会有已为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历史效果的出现。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及其后的追随者们，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效果，他们利用这种紧张所产生的势能，形成对现实文化格局的巨大冲击力。作为一种历史性活动，这种紧张的制造包容着一个巨大的策略性策划和非宣言性目标期待。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这样做，一切都难于改变；而这样做的结果，也不过是“仅得其中”，能从传统中开出一条生路来罢了。在它凝聚为“五四文化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人们所认识时，却不能不清醒地理解作为以历史先锋为角色选择的那些启蒙主义者们的深在苦心，及其个人在文化建树方面

所作出的崇高的牺牲。但是，无论怎么说，从文化科学的角度来讲，要评价和发展中国文化，把标准确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点上是行不通的。开放性的借鉴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以西化为标准。

应该看到，在本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五四精神”作为一种巨大的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使他们主动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不断前行。但由此形成的文化模式也从另一面约束着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尤其在文化学术领域，由其造成的误解和误导，则更见严重。其突出表现就是以启蒙主义立场的排他性，否定其他价值范畴的合理存在。对于发生在其他价值范畴里的文化、艺术主张和流派，基本取否定态度，对其近期的积极效应和远期的合理性一概视而不见。而价值评判亦呈倾斜状态，其核心则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新时期登上学坛而表现出深刻创造性的许多学者，其历史性的创辟就是对于启蒙主义文化立场的寻找和回归，但讷知幸耶非耶，当他们重开解放之路时却难以实现新的超越。至今仍使他们困惑的不应是对社会历史批评方式的选择，而是对启蒙主义历史责任的主动承当和角色选择！他们以历史参与者的角度进入研究，越是投入就越是翅膀沉重。现在，已经开始世纪性的辞旧迎新，我们应该调整、转换角色选择，从“五四文化模式”中超越出来，只有这样，文化、艺术批评，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建构的科学时代才能够早日到来。

# “新文学”史断代上限前延的依据和意义

##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必要阐释

“20世纪中国文学”，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从时间的界定上来说，顾名思义，它所指称的当然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但这也只是一种大致不差的说法，很难说它的上限就一定是1900年。从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其上限应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至于下限，因为这一过程迄未完结，亦不能就预定在1999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一文学过程分解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阶段。和“20世纪”一样，“近代”、“现代”、“当代”也是表述时间的概念，而且，由于这三个概念所包容的历史内容及其对文学的制约和要求不同，三个时期的文学确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表征，据此来研究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和“20世纪”不同，这三个概念虽然也是表述时间的阶段性的，但它们却带有明显的历史人文色彩，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指向，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依据这种社会政治革命的分期来划分文学发展阶段，又必然会有削足适履之憾。事实上正是如此。对政治分期的依附，意味着对政治尺度的依附，其结果必然是对文学史固有尺度的相对漠视甚至放弃。于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过程可能被腰斩，使二级分期上升为一级分

期，而且会导致分界线的错认；同时，分期标准直接关联着评价标准，对文学现象的错评误评也会在所难免。

由于传统的文学分期，从学界到一般社会读者，都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印象，似乎与古典文学相颉颃的新文学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才开始发生。殊不知这种认识是有悖于事实的。如果我们不仅仅把“新文学”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学”的特指，而是从与古典文学相颉颃的意义上，从新文学基质的规定性上作松动一些的理解，那就不难发现，虽然五四文学革命表现出了更为彻底、更为强劲的叛逆精神和摧枯拉朽的力量，但这一文学的历史变革则早已开始。从新文学所必备的基质和由其所决定的基本倾向而言，早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种文学就已萌生且自成规模了。

这由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 一、白话文的提倡。

白话文的提倡一向被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和表征，可是早在 1897 年，裘廷梁就已响亮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他从国之兴亡的高度，异常尖锐地直陈了文言的弊端：

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

……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皆受之矣；不宁惟是，愈工于文言者，其受困愈甚。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廛廛足自娱，益天下盖

寡。

作为比照，他一一历陈了白话的八大益处，并于结语处旗帜鲜明地主张：

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言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从裘廷梁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第一，废黜文言是因其误学、误民、误国，立足点在于开发民智，振兴中国。与“文学革命”论者相比，都是把倡兴白话视为相关于历史变革的必经环节，“工具革命”的意识已相当明确。第二，在其对白话“八益”的具体解释中，已涉及到有利于发展创造性思维的问题，即“六曰炼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特熟读，而特精思，脑力愈浚愈灵，奇异之才，必将迭出，为天下用”。往下再作引申，又提出了便于不同类型思维的开发培养和人才的多样性发展问题：“七曰少弃才：圆颅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为白话，庶几各精一艺，游惰可免。”第三，从语言文字的价值认定来说，对文言实用价值的否定自然在于首当其冲之列，而对传统文人势必固守的最后防线即美的价值确认问题，也从语言发展的规律上给予了有力的批驳，断言“文言之美，非真美也”。第四，对文言之为害的愤激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历史上虽然白话文（主要是白话文学）也流传多年，但作为文人的价